

目 录

上卷 中国古代吏治研究

绪 论 治国先治吏	3
一、治国患社鼠猛狗	5
二、治国必先择吏任官	8
三、治吏必考绩核真	13
四、治吏必奖廉惩贪	17
五、治国必先端正吏风	18
第一章 中国古代官吏制度概述	23
第一节 夏、商、周时期的官制	24
第二节 秦朝官制	29
第三节 西汉、东汉官制	31
第四节 三国官制	36
第五节 两晋与南北朝时期的官制	38
第六节 隋朝官制	43
第七节 唐、五代十国官制	45
第八节 宋朝官制	48
第九节 元朝官制	50
第十节 明朝官制	52

第十一节 清朝官制	54
第二章 古代官吏选拔与任用	60
第一节 古代的选拔任用制	62
第二节 古代选人用人思想探析	104
第三节 古代选人用人谋略	136
第四节 古代官吏的考课与管理	171
第三章 古代廉政监察制度	185
第一节 廉政监察制度萌发于先秦	185
第二节 监察制度形成于秦、汉	191
第三节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监察制度	198
第四节 监察制度鼎盛于隋、唐、五代	201
第五节 宋朝的监察制度	205
第六节 辽、金、元代的监察制度	207
第七节 明代的监察制度	211
第八节 清朝的监察制度	215
第四章 古代的惩腐与倡廉	219
第一节 腐败产生的根源和危害	220
第二节 古代反腐倡廉史纲	246
第三节 古代反腐倡廉的典范	279
第五章 廉政史鉴	315
第一节 克己奉公 忧国爱民	323
第二节 清正廉洁 甘守清贫	340
第三节 力戒奢侈 不贪酒色	354
第四节 刚正不阿 以法治国	364
第五节 管教亲属 严惩贪官	383

下卷 中国现代吏治述评

第六章 中国现代吏治概述	395
第一节 中华民国临时政府时期	395
第二节 北洋政府时期	398
第三节 中华民国国民政府时期	408
第四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	428
第五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	436
第七章 中国共产党的干部政策与制度	449
第一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党的干部政策	454
第二节 新中国成立后的干部政策与制度	463
第八章 健全和完善党的干部选拔任用制度	497
第一节 对现行干部选拔任用的反思	498
第二节 改革和完善党的干部制度	501
第九章 现代廉政监察制度	522
第一节 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廉政监察制度	522
第二节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廉政监察制度	533
第三节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的廉政监察制度	549
第十章 反腐倡廉的现状与思考	579
第一节 腐败现象的表现和产生原因	580
第二节 反腐倡廉是一场严肃的政治斗争	589
第十一章 反腐倡廉的对策研究	598
第一节 从严治党是反腐倡廉的根本决策	598
第二节 深化政治体制改革是反腐倡廉的治本措施	623
结束语 跳出历史兴亡“周期率”	656
一、毛泽东与黄炎培的对话	656

二、阵痛与困惑	658
三、执政党向何处去	664
四、兴衰存亡的工程	666
五、让人民监督政府	680
六、关键在于治党	683
七、百年苦斗	687
主要参考书目.....	691
后 记.....	694

吏治论

主 编：王寿梅

执行主编：张耀中

副 主 编：周建国 冯国堂

杨延欣

河南人民出版社

上 卷

中国古代吏治研究

绪论 治国先治吏

一个朝代政治的治乱,一个时期社会风气的好坏,往往与吏治有着密切的关系。吏廉则治;吏不廉则政治削,政治削则国家亡”(《宋会要辑稿》、《职官》卷五七)。历代王朝的更迭兴衰,可谓是“其兴也勃焉,其亡也忽焉”。古代的思想家、政治家无时不在苦苦寻觅着摆脱历史周期的支配,无时不在渴望着国家能够政治清明,人民能够安居乐业,无时不在探求着国家、民族的强盛之路。然而,在诸多的治国理论中,一个重要的思想就是治理好国家首先要治理好官吏。只要把官吏治理好,国家也自然能治理好。《周礼·卷二》也很早就提出“以六典治国家,以八法治官府”的问题。《周礼》中主张的“以八柄驭群臣”,实质上就是整肃吏治,劝善惩恶,赏罚严明,恩威并用。

“以六典治国家”的具体内容是:第一叫做治典。治典用以治理国家,管理万民。第二叫做教典。教典用以安定国家,教育官府,教化万民。第三叫做礼典。礼典用以使国家太平,百官廉正,万民和乐。第四叫做政典。政典用以使国家太平,百姓廉政,万民和乐。第五叫做刑典。刑典用以查禁国家里出现的坏人坏事,惩治犯罪官员,纠察万民。第六叫做事典。事典用以使国家富裕,任用百官,养育万民。

“以八法治官府”的具体内容是:一曰官属,即长官有属官,治国之事才有人去操办。二曰官职,即六官各有其职,才能区别某项

国事属于谁的职责范围。三曰官联,即有些大事一官不能独办,需要众官共同去办才能办成。四曰官常,即各自在自己所任官爵的职权范围内尽心尽职。五曰官成,即各官可依旧例去办理治国之事。六曰官法,即各官职所主之法度,用这些法来匡正国家的政令、法制。七曰官刑,即官中之刑,用此来纠察邦治。八曰官计,即平治官府之计,也就是说对在考核之中有失者裁断之。

“以八柄驭群臣”的具体内容是:一是给以爵位,使其显贵。二是给以俸禄,使其富裕。三是给以赏赐,使其亲幸。四是给以安置,使其行善。五是给以恩养,使其福寿。六是削夺官职,使其贫困。七是流放外地,使其罪有应得。八是口头责备,使其不犯过失。

《韩非子·外储说》说:“善张网者引其纲,不一一摄万目而后得。一一摄万目而后得,则是劳而难。……吏者,民之本纲也,故圣人治吏不治民。”中国古代吏治的核心内容包括了对官吏的设置、选拔、考核和监督。在历代王朝正常发展的历史条件下,选用和考核人才,不断更新国家政权的官吏,成为一项统治阶级极为重视的基本国策,适应了封建集权政治统治的需要和国家行政管理的国体民情。选、考、监总的关系是:在选拔任用官吏之前,必须通过认真严格的基础知识考试,以此测定为官的基本条件和智能水准,也就是为官资格的鉴定,以此来保证官员队伍的质量。任官后定期考核(考绩),以检验其从政的能力和本领,确认其实践活动的效果。再通过法律监察以检验其法律素质及品德行为,进行肯定或否定,进行罢黜或升迁。考选是一种资格鉴别,考核是一种质量跟踪检验,监察则是对二者的保证和抉择。选、考、监三位一体,互相协调又互相制约。考选是由各级政府协助礼部和吏部共同施行,考绩归吏部实施,监察则属御史台实行。这一整套很有特色的官吏选拔考试、考核奖惩、监督检查制度,是一笔十分宝贵的文化遗产。通过考选对官吏任职资格进行初步鉴定,再通过考绩对其

任职能力进行定期再检验以达到优胜劣汰。考核的重点是考绩和德。绩是政绩,就是对国家的贡献和建树,德就是官德,即为官的道德、操守、品质。这种由感性认识到理性认识的不断鉴定考核,相应地在一定程度上保证了官吏的质量,为促进国家的吏治清明起到了积极作用。

一、治国患社鼠猛狗

春秋战国时期著名的政治家晏子指出:治国有两大祸患,一是社鼠,二是猛狗。《晏子春秋·内篇问上》记载有齐景公问晏子:“治国使人最忧虑的是什么?”晏子回答说:“使人最忧虑的是那些土地庙里的老鼠。”景公说:“为什么呢?”回答说:“说起土地庙,那是用木材和泥土建造而成的。上有梁檩,下有土墙,老鼠于是就把它当做寄身的地方。用烟熏它,恐怕把梁檩烧坏,用水灌它,又恐怕把墙壁浇坏。这就是老鼠不能捉杀的原因,完全是为了保全土地庙的缘故啊!说到整个国家,也有像土地庙里的老鼠那样的东西。他们就是君主左右的亲信。这些人对内颠倒善恶,蒙蔽君主,对外依仗权势,重敛百姓,从中渔利。不杀他们国家就要大乱,杀掉他们则为君主所庇护,要么坚持不从,要么平反其狱。这些人就是国家的社鼠。”

“宋国有一个卖酒的人,店里器具很清洁,牌子也很大,然而把酒放酸也卖不出去,只得向邻人询问其中原因。邻人说:‘您的狗太厉害了。买酒的人带着器具进到店里面,买您的酒,您的狗迎面扑上来就咬,这就是您的酒放酸而卖不出去的原因。’说到一个国家也有像酒店里那样的猛狗。他们就是在您的朝廷中当权的人。怀有好的策略、方法的仁人志士想把自己的智慧进献给君主,而那些用事当权的就迎面扑上来咬他们,这些人就是国家的猛狗。君主左右是社鼠,当权的是猛狗,下情不能上达,贤者拒之千里之外,君主您怎么会不受蒙蔽,国家怎么会没有灾难呢?”

晏子指出,社鼠指君主的左右亲信、嬖臣、近臣之类,他们依仗

君主的庇护,为非作歹,他们就像土地庙中的老鼠那样,捉杀不得。所谓猛狗,是指朝廷中各种用事的权要。酒店里有猛狗,主人的酒卖不出去;朝廷中有猛狗,则仁人志士进不来。君主左右是社鼠,君主就不能了解事情的真相,不了解事情的真相难免就会做出错误的决策,其结果必然导致天下大乱。权要者若是猛狗,贤士就得不到推举任用,贤士得不到重用,奸佞之徒就会充斥朝廷。他们粉饰君主的过错,歌颂君主的谬误,以此蒙蔽君主,其结果必然给国家带来严重的灾难。因此,除掉这些猛狗和社鼠,除掉这些老虎身上的苍蝇,国家才会具备得到治理的条件。

在封建专制的社会里猛狗、社鼠俗称奸臣,如同污泥浊水无处不漫流,危及社会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个方面,遗患无穷。他们的共同特征是嫉贤妒能,残害忠良;惟利是图,嗜权如命;多疑善变,反复无常;阴险狡诈,虚伪成性;豺狼本质,虺蝎之心。他们大多是不学无术的无赖小丑,有的以侥幸心理和一时的机缘步入仕途,有的靠裙带关系、吹吹拍拍爬上高位。奸佞之徒的这一本质,就决定了他们要打击、迫害、诽谤乃至消灭贤能者。凡奸佞之徒,一举一动,所作所为,无不围绕着金钱、权力转动。他们为了一己私利,不顾一切,可以出卖灵魂,可以杀妻烹子,可以弑君废后,可以诛戮同党。甚至不惜抛宗弃祖,认贼作父,寡廉鲜耻,见利忘义,嗜权如痴,得陇望蜀。由于奸佞之徒的所作所为都是从一己之利出发,违背国家和民族的利益,这就决定了他们的一切活动都是躲在阴暗角落里密谋策划而不可告人的。他们是魑魅魍魉,当面却要装成人样。为了讨好主子,伪装恭顺,为了威慑同伙,又需要面目狰狞。他们像一条变色龙一样,随气候环境的变化而不断改变自身的形态与色彩。

他们暗藏匕首或手握钢刀要杀人,却又装出猫哭老鼠的模样借以掩其杀人真相,他们罗织罪名,陷人于死地,却又装出一副关心的面孔,以忠诚的姿态掩盖其本性特征。当他们尚未获得金钱

和权位的时候,为了取得君主的信任,可以唾面自干,俯首帖耳,性命是从;当其得到金钱、权位之后,又希冀独揽朝政;当其权位达到顶峰之日,又妄想取代君位。一旦私欲受阻,昔日之至交,可以刀兵相向,今朝之同党,也以杀之为快。至于对待百姓,更是视同草芥,诛杀随心。由奸佞之徒本性所决定,他们必然与刚正不阿、廉洁奉公的贤能忠良之士在本质上若草木与金石之不同类,在同一时期同一机构里,忠奸势不两立的局面也必然出现,于是就出现了奸人进用则贤能退隐。如若广进贤能之士,则不学无术和投机钻营的奸佞之徒就无所容身,这些丑类不能容身,则正气必然上升,吏治必然清明。

当然,识别贤能忠良与奸佞之徒也并不容易,若能经常不断地进行各种严格的考核,测其学识,验其才能,考其功绩,观其表现,察其言行,则优劣自明,忠奸自现。在考察过程中,重调查研究,不轻信流言,不偏听谗说,应倾听民意,如实判断,则真相自明。当奸人贼子和佞幸小人的罪恶未彰、劣迹不显时,特别难于认识,因为他们利用各种伪装,又接近权力中心,往往能以各种手法骗得信任,特别是大奸巨逆,能以小善中之意,这就要求身居高位、手握大权者,切不可个人恩怨为取舍标准。阿谀逢迎者,其心大抵不正,直言极谏者,本质大都纯美。凡不干实事,终日讲人缘,拉关系,寻门路,探消息,到处钻营,亲近要人,招摇过市者,一旦获取权位,定然成为奸佞。凡埋头苦干,敬上不谀,有功不傲,得之不喜,失之不忧,不随世俗,敢作敢当者,大都属于正人,一旦重用,定是栋梁之才。

一个国家是否强盛,其主要标志要看这个国家是否清明,经济是否发达,国库是否充实,文化是否发展。由于封建王朝的社鼠、猛狗不断滋生,吏风败坏致使政治腐败,国家积弱,民不聊生。历代统治者也千方百计地整顿吏治,惩治腐败,但收效甚微。封建官僚体制给贪官污吏、奸佞贼臣提供了滋生的土壤,统治阶级穷奢极

欲地追求奢侈豪华的生活 ,就决定了他们必然自毁、自乱、自败 ,封建剥削阶级的专制制度和腐朽没落的意识形态 ,就决定了社鼠、猛狗存在的条件和滋生的土壤。这是政治腐败屡惩不绝的根本原因。

二、治国必先择吏任官

吏治好坏关系到国家的兴衰存亡 ,吏治的关键又在于选官、任官、考核、管理。一个国家 ,一个民族要想兴旺发达 ,必须能正确地选拔德才兼备的人才。《礼记·中庸》说 :“文武之政 ,布在方策 ,其人存 ,则其政举 ;其人亡 ,则其政息。”王符《潜夫论·思贤》说 :“疾者 ,身之病 ,乱者 ,国之病也。身之病 ,待医而愈 ;国之乱 ,待贤而治。”讲的正是治国关键在于择官用人。《吕氏春秋·慎大览第三》记载了齐桓公去见小臣稷 ,一日三至而不得见。随从齐桓公的人说 :“作为一个国君 ,想见一个平民百姓 ,一天去了三次都不得见 ,也可以停止了。”桓公说 :“不是这样 ,志士往往把俸禄和爵位看得很轻 ,所以他就不重视他的君主。他的君主如果把成就霸业看得很轻 ,也就不重视任用志士。即使小臣稷看不起俸禄和地位 ,我难道也能够看不起成就霸业的大事吗 ?”于是就继续去拜访 ,谁也不能够阻拦他。志士傲视俸禄和爵位 ,从而也就傲视他的君主。而君主如果不把成就大业放在心上 ,也就不会重视贤士。

《吕氏春秋》中还记载了齐桓公在管仲晚年的一次关于任相的谈话 ,在用人问题上颇能发人深思。桓公问管仲竖刁这个人任相如何 ,管仲分析说 :人们的本能都知道爱护自己的身体 ,竖刁竟把自己阉割了来迎合侍奉您 ,像这样连自己身体都不爱护的人 ,怎么能爱君主而助理国政呢 ?桓公又问卫国公子开方这个人怎么样 ,管仲回答 :从齐国到卫国 ,不过十来天的路程 ,开方侍奉您 ,为了让君主高兴 ,十五年都不回家探视父母 ,他如此对待亲生父母 ,又怎能对君主有真正的感情呢 ?桓公又问易牙这个人怎么样 ,管仲回答 :君主喜欢吃美味的东西 ,他想方设法都给弄来了 ,君主没有吃

过的只是人肉，易牙为了讨好君主，不惜杀死儿子拿来烹调端给君主吃。世人哪有不爱儿子的！这种人对儿子都如此残忍，难道还能够爱君主吗？

后来，管仲老了，齐桓公就问宁戚：怎样才能使国家稳定，百姓丰衣足食？宁戚说：“关键在于得到贤才。”齐桓公又问：怎样做才能得到贤才？宁戚分析说：打开进贤的道路，通过考察，加以任用，提高他们的爵位，增加他们的俸禄，张扬他们的名望，这样做，天下有志之士就会纷纷到你这里来。一个国家之所以不能广招贤士，是因为存在五种障碍：人主不喜欢人才，那些没有才能而又善于阿谀奉承的人就会围在身旁，他们肯定会妨碍贤才，说别人的坏话，这是第一种障碍；进献良策，言谈有利于治国的人才不被重用，这是第二种障碍；言路堵塞，耳目遮蔽，选人要通过周围亲近的人才能被国君了解，这是第三种障碍；选人像审问犯人似的盘根问底，用固定的标准以个人的好恶挑剔别人，这是第四种障碍；属下的官员独揽国政，任人唯亲，这是第五种障碍。铲除这五种障碍，英雄豪杰、志士仁人就会一起来投奔，不铲除这五种障碍，君主就不会了解官民的真实情况，堵塞了贤士进取的道路。

《淮南子·汜论训》提出了鉴别贤才的方法，大意是：人的感情与思想的美与丑、善与恶总是在一定的环境中通过具体的言行表现出来，高尚的品德与出名的才华，在各种不同环境的人的身上同样都会闪光。另外，还要考察他对待困难的态度，从而了解他是否有勇气；用欢喜和快乐的事去刺激他，看他是否有高洁的操守；用金钱和财宝去试探他，看他是否有廉洁的品质；用恐怖和灾难来震动他，看他是否有贤贞的气节和不屈的品格。

《晏子春秋·内篇谏下》记载：晏婴向齐景公阐明了一个国家真正的三不祥。有一次齐景公出外打猎，上山见到老虎，下泽见到蟒蛇。回来之后，召见晏子并问他：“今天我出去打猎，上山就见到老虎，下泽则见到蟒蛇，大概是不吉祥吧？”晏子回答说：“国家有三种

不吉祥,这些跟它没有关系。国家有德才兼备的人而君主不知道,这是一不祥;知道有德才兼备的人,可是不去任用,这是二不祥;任用了德才兼备的人,可是不给予信任,这是三不祥。所谓不祥就是指上面说的三种情况。今天上山见到老虎,因为山是老虎的窝呀,下泽见到蟒蛇,因为泽是蟒蛇的窝呀。到老虎的窝里见到老虎,到蟒蛇的窝里见到蟒蛇,怎么能把它叫做不祥呢?”

通过这番对话,晏子把国有贤士而不知、不用、不信等用人方面的三大弊端深刻地揭示出来了。

如何使用人才,如何选择官吏,古代的哲人也提出了几个非常值得注意的问题。一是不能凭个人的好恶用人,凭个人的好恶是埋没、毁坏人才的一个主要原因。二是不要听信谗言。因为世俗喜欢嫉贤妒能,爱说贤者、智者的坏话,甚至有的专门利用挑拨离间的手段来毁灭人才。三是宽容大度,不念旧恶。有些人虽然曾经和自己政见不同,但只要确有才能,就应该千方百计地争取、任用。四是不要受资历、地位的局限,只要有真才实学,品德高尚,即使地位低、资历浅也同样任用。

在什么人可以当官的问题上,墨子的思想有很大的突破,他主张尚贤使能,谁贤能就推举谁。他严肃指出,要想把国家治理好,最重要的方法是尚贤使能。一个国家能不能用贤,或者贤人的多少,决定着这个国家的治乱兴衰。《墨子·尚贤》篇说,让那些尊贵智慧的人为政,治理那些愚笨卑贱的人,国家能够得到治理;让那些愚笨卑贱的人为政,治理那些尊贵智慧的人,国家就会发生混乱。因此,可以知道崇尚贤才是治理国家的根本大计。所以古代的圣王非常尊重品德高尚的人,任用有才能的人,在这个问题上不袒护自己的父兄,不偏袒高贵和富有的人。把那些品德高尚的人提拔起来,使之富裕尊贵,让他们去做官长。对那些品德不高尚的人,则要降其职甚至废去,使他们贫贱,让他们去当徒役。因此,百姓都为贤者得到赏赐而受到教育,坏人受到惩罚而产生畏惧,一起

来修养自己的品德 ,做善事 ,做好事 ,这样 ,品德高尚的人就越来越多 ,坏人就越来越少 ,这就叫做进贤。

尚贤使能的路线是正确的用人路线 ,但是如果不认真执行 ,那就只是一纸空文而已。所以 ,荀子在《致士》篇中说 ,君主所忧虑的 ,不在于口头上说用贤 ,而在于不真心 ,不坚决地去用贤。荀子尖锐地批评了那些口头上用贤而实际上却在退贤的错误行为。前面已经说过 ,在贤能被任用之前存在着不了解 ,了解之后不被推举 ,推举之后不被任用的问题。即使在被任用之后也仍然存在着危险。因为当权者的见识有限 ,周围的奸佞之徒又嫉贤妒能 ,所以对贤能往往是用而不终 ,使贤能的事业半途而废。古代在任贤的问题上存在着十个难题。荀悦在《申鉴·政体》中很贴切地阐述了“惟恤十难以任贤能”的问题 ,并指出 :只有忧患“十难” ,那些品德高尚、才能出众的人才能得到任用。一是叫做不知道 ;二是叫做知道而不推 ;三是叫做推举后而不任用 ;四是叫做任用而不用到底 ;五是叫做因为小的不满而忘了他们的优秀品德 ;六是叫做因为小的过错则去掉了人家的大功 ;七是叫做因为一点小小的失误掩盖了人家大的贡献 ;八是叫做因为揭发奸佞之徒而伤害忠正之士 ;九是叫做用邪恶的言论扰乱了正确的态度 ;十是叫做因为谗言和妒嫉而不用贤能之士。这些就叫做“十难” 。如果“十难”不排除 ,那么品德高尚和才能出众的人是不会得到任用的。

不同的用人路线 ,有着不同的治理后果。这似乎也是一种规律 ,个人的意志是无法改变的。如果真的能任人唯贤 ,使俊杰之士各在其位 ,那么治理好自己的国家并非难事。遗憾的是历史上的情况并不是这样 ,那些昏庸无能的当权者 ,总是让愚蠢的领导聪明的 ,让品德低劣的管理品德高尚的 ,这样是非颠倒 ,黑白混淆 ,致使吏治腐败 ,政治昏暗 ,势必会引起社会的动乱。这些官吏们把愚笨的人当成秀才 ,把虐待父母的人当成至孝之人 ,把贪得无厌的人当成廉洁之人 ,把狡猾的人当成正派之人 ,把谄媚讨好、阿谀奉承之

徒当成直言敢谏之人 ,把轻薄的人当成厚道之人 ,把空无知识的人当成有学问之人 ,把昏庸暗昧的人当成明经之人 ,把残酷无情的人当成宽厚博雅之人 ,把胆小如鼠的人当成勇武威猛之人。总之 ,他们向皇帝所推荐的人才 ,一般都名不副实。为什么会出现这种情况呢 ?富裕的人凭着他们的财力得到荐举。地位高的人凭着他们的权势得到荐举。群僚把钱多当成品德高尚 ,把势力强大当成才华出众。因此凡是得到任用的 ,一般都不称职 ,从而国家的吏治就混乱不堪了。

王充认为 ,不能举贤的最重要原因在于暗昧的当权者爱好提拔俗吏 ,并且把他们放在贤明的有知识的人才之上 ,让有知识的人才去听从没有知识的庸俗的官吏的指使。结果 ,不少有知识的人 ,不甘其辱 ,只好隐居山林。这样就造成了愚蠢的俗人当政 ,有知识的人才被遗弃于野的悲剧。这对于一个国家和民族来说 ,是最大的不幸。这也是个值得深思、值得研究的重大问题。

贾谊在《官人》中把国家众多的官吏分为六等。一等叫做老师 ;二等叫做朋友 ;三等叫做大臣 ;四等叫做左右 ;五等叫做侍从 ;六等叫做杂役。

知识丰富得像源泉一样 ,行为端正得足以做别人的表率。询问事情能够立即答复 ,求他办一件事情 ,能够得到良好的结果。这种人到了诸侯的家里 ,能够使诸侯的家庭显得更加重要 ,到了别人的国家里 ,能够使别人的国家更加昌盛。这就叫做老师。

知识多得像磨石一样 ,足以相互切磋 ,行为能够当做自己的辅佐 ,仁爱之心能够相互商量、议论 ,明察能够推荐贤人 ,胆子能够黜退不好的人 ,对内能矫正君主的失误 ,对外能宣扬君主的美德。这就叫做朋友。

知识丰富得足以谋划国家大事 ,行为端正得足以做百姓的表率 ,仁爱之心足以使君臣上下关系融洽、和睦。国家所有的规章、法度自己都能够遵守 ,国君有了灾难则积极进前不惜牺牲自己。